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中国西部 大开发 经济转型

China's Open Up
the West Program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刘世庆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基金课题(00BJY006)

中国西部 大开发 经济转型

刘世庆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蜀伟
责任校对：董蔚挺
版式设计：波视墨通
技术编辑：潘泽新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

刘世庆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690×990 16 开 23.25 印张 370000 字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058-3577-7/F·2888 定价 2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西部大开发的深层考察

林 凌

近几年来西部开发研究，多以区域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推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从而实现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出发的。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国家在西部进行的五大标志性工程的建设：生态环境建设、西气东输建设、西电东送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青藏铁路建设，促进了东西部的协调发展，普惠全国，也是成功的。但是，对西部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问题的研究和采取的措施却相对较少。如果西部大开发只依靠外力拉动，而形不成内在增长机制，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是刘世庆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这部著作中，她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选择经济转型这个新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她的这一著作深化了研究的层次，把西部经济开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何种发展水平的国家，迟早都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也不能例外。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題。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① 发展经济学的

^① 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大师 W. 罗斯托、H. 钱纳里、S. 库兹涅茨等，从多国的实践中，把一个农业国到实现工业化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每个大阶段又有两个或三个小阶段。每个小阶段又有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长度。阶段的划分是以人均 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达到的程度为依据的。H. 钱纳里等根据先行国家的大量数据，归纳、提炼出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多国经济增长模型。^① W. 罗斯托提出的《从起飞到自我持续增长》的理论，给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经济起飞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我国接触这些大师的著作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1984 年才由他的学生万典武、曾启贤翻译成中文出版；罗斯托虽然在 1983 年就访问了中国，但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到 1988 年才由贺力平等翻译问世；其他几位发展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如 H. 钱纳里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S. 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等，出版时间都在 1989 年之后。但令我们庆幸的是，由于市场导向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们有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础，从而能够用这些理论来校正我国工业化走向的偏差，指导我们走上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1994 年，我接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委托，和刘世庆同志一起，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考察。这是我学习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初次尝试。我们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学习罗斯托、钱纳里、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惊喜地发现，与这些大师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模型和数字相比较，我国东南沿海 7 个省市的人均 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基本上与他们提出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高速增长阶段”的指标相符合。按照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第二阶段又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小段需要花费 22 年，第二小段需要花费 17 年，第三小段需要花费 14 年。我们所作的判断是，全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第一小段，东南沿海则处在第三小段。据此，我们进一步判

① 参见 H. 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断,东南沿海经济已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工业化的进程要比全国快15年左右,比欠发达地区可能快三四十年。^①1994年到今天已近10年时间,回头来看,我们当时所作的判断,可以说是来不及而无过之,深感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使我们感到,在西部大开发研究中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作指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刘世庆同志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研究西部开发问题是一次新的尝试。她首先作出的判断是,当前西部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增长阶段。W.罗斯托在为他的著作《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地大物博,人们可以发现这个国家中的不同地区,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增长阶段都在这里同时并存。”^②W.罗斯托对中国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说我们1994年研究的东南沿海地区是最高级增长阶段的话,那么,西部就是低级、最低级的增长阶段。2002年东部人均GDP比西部高1.57倍,比最落后地区四川甘孜州高3倍,就是一个例证。刘世庆同志判断是,西部经济总体上正处在W.罗斯托所指出的“自我持续落后”向“自我持续增长”转型时期,为此,西部经济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转型: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从而推动西部经济的起飞。我认为,这个研究更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把发展经济理论与转型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西部开发,是本书又一个新的尝试。发展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基础之上的。按照发展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经济增长阶段的推进,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并不存在体制的障碍;利用外资和发展外贸,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所需要的,也不存在障碍。而在中国,虽然也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格格不

① 参见林凌、刘世庆著:《中国东南沿海经济起飞之路》,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② W.罗斯托编,贺力平等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入。因此，中国要走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实现经济起飞，经济转型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

经济转型是我国特有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转型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正在形成。

经济转型一般指的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我国，这一转变是在渐进改革中进行的。社会没有发生震荡，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人们不知不觉地适应了这一个巨大的变迁，并从中得到从未有过的利益和获得新利益的机遇。中国转型的成功，被誉为中国的奇迹。

与体制转型相联系，在我国还派生出两个转型：一个是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另一个是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大差异。经济结构的转型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为以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结构。现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个转型，最主要的标志是，我国经济形成了第一二三产业依次推移和演进的经济结构，不但使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而且使广大人民群众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得到实惠。当然，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我们已转移到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的轨道，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规律格格不入，也难以融入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市场，因此必然导致封闭并排斥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要务之一，就是要按照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律和惯例，使中国的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把封闭的中国经济转变成向世界开放的经济，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自己，同时为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国在这方面的转型是做得很出色的。加入 WTO、吸引外国投资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第五贸易大国，最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转型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但应当承认，转型的进展是很不平衡的。发达的东部地区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在经济体制上，东部已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私有、外资、混合所有等构成的多元市场主体已经形成，国有比重小，但掌握

着国民经济的命脉，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非国有比重大，已成为国民经济竞争性领域和出口领域的主力。市场结构中，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服务贸易市场的发达程度虽不及发达国家，但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外资银行、外国保险公司等应有尽有，间接和直接融资都很方便。在经济结构上，对国内、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大大增强，外国高新技术产业源源涌入，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制造业和服务业已成为拉动东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对外开放上，东部是我国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集中地，也是跨国公司各类外商投资的首选地，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出发地。总之，东部在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都已走在我国的前列。正由于转型的成功，东部已有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扩张的能力，可以靠内在动力发展、并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了。

反观西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政府还起着重要作用，国有经济改革严重滞后，比重仍然很大，私有经济发展很慢，比重很小，整个经济尚未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格局。市场结构很不健全，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都不发达，间接、直接融资都有许多难度。在经济结构上，重型机械制造、军事工业等继续保持“大而全”的封闭状态，对地方经济缺乏带动作用；在东西部产业分工上，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格局基本未变；在轻重工业的比重上，70%以上的日用消费品仍由东部供应；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资本都很低，在GDP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整个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严重缺乏内在的自主动力。因此，西部要尽快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状态，必须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和西部大开发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同时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有较深的造诣。在本书中，她以罗斯托的著名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对西部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这一研究着眼于提高西部内在的自主发展动力，是对西部大开发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层次的提升。我们热烈期盼这一著作的出版。

2003年6月9日于成都

前 言

中国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跨世纪的宏伟战略，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华民族新的崛起而谋篇布局的“两个大局”中的另一个“大局”，不仅是国内近年热烈讨论的题目，而且引起国外学者、政界、企业家的广泛关注。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经济转型》(00BJY006)的最终成果。本书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西部经济转型。发展经济学著名学者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起飞”过程，完成这个转变前的经济，是“自我持续落后”的经济，转型后则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经济。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看，正面临着这个紧迫的转型要求从而“起飞”的可能。因此，西部经济转型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制转型，激发制度活力；二是产业转型，激发结构活力，提升西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由于这两个转型又是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本课题对西部经济转型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而不是单纯研究体制转型的报告。

无疑，工业化是落后地区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核

心，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们希望进一步回答：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路子怎么走？面临哪些紧迫问题？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遭遇过的“低收入工业化陷阱”？西部地区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未能在1978年已经基本奠定的工业化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目前国内讨论西部工业化道路及其对策的成果很多，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从罗斯托的部门分析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观察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结构矛盾，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战略和改革政策。

罗斯托的部门分析理论和发展观十分强调“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的决定意义，他在分析中揭示了工业化和现代增长的动力与规律：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的变迁，主导产业不断高潮继起的更迭，推动着工业化的进程。西部地区的问题正是在于：现代工业发展主要是在资源开发和战备要求两大动因推动下展开的，资源开发、战备需要、重工业优先、国家直接投资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下的西部工业化道路，决定了西部地区的结构特征：以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重工业、军事工业、中央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规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

这种结构对西部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带来四个方面的突出矛盾。（1）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格局，制约着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深化和发展；（2）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东部以轻工和日用消费品生产为主、西部以重工和国防安全、生态保护等社会公共产品生产为主的社会职能分工，制约了西部工业的贸易能力和积累能力；（3）主导产业、中央企业、大型企业难与地方经济融合，先进的甚至十分尖端的军事工业，与周围落后的地区经济同时并存，卫星、原子弹、航空航天等尖端技术与落后的农村和地方工业并存，形成所谓“二元结构”特征，主导产业的带动能力弱；（4）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体制矛盾十分尖锐，破坏了社会分工、专业化、规模化、

协作从而工业的效益和发展。

这4个方面的困扰实质上集中于两点：

第一，垂直分工格局和畸形的重型结构，影响了西部工业的贸易能力和积累能力，进而影响再投资能力和区域竞争力，并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着西部工业化进程。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工业发展道路的大转折时代。持续30年之久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指導思想和“先生产后生活”、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方针发生重大转变，国家出台“六个优先”的政策鼓励发展轻工业，鼓励出口优先和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压抑了几十年的消费品需求，积累了几十年的短缺矛盾，突然爆发出来，为轻工和消费品工业的大发展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市场机遇。借助这个庞大的市场机遇和改革开放的动力，加之国家政策的倾斜和照顾，东部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他们的创业热情、勤奋精神和灵活的体制机制，低廉的产品成本，适应长期短缺时代群众对日用消费品的渴求，东南沿海和江浙地区迅速成为日用消费品和新型轻工产品的供应基地，一段时间里甚至出现全国喝广东水、吃广东饼干、穿广东服装的壮观场面。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大好机遇面前，西部地区却由于体制、机制、政策、存量结构等种种原因，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机遇，与东部的差距迅速拉大。东部的主导产业20多年来已经换了两代，从最初以“老三件”、饮料、饼干为主的消费品工业，向“新三件”、耐用消费品、家电为主的新型消费品转型，再到现在以电脑、手机、汽车、信息产品等为代表的高档消费品、高科技消费品的提升，东部工业的规模、档次、竞争力与日俱增；反过来，工业的发展和地区收入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为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市场空间；西部地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又使东部企业继续保持着低工资低成本的优势。不仅如此，马太效应还把西部地区有限的资源，包括资金、人才、产

业等各种要素，继续不断向东部吸引。困难之处还在于，某种结构一经形成，往往具有十分顽固的惰性，调整和转型十分缓慢。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格局和畸形重型结构，改革开放后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进一步加剧，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后普遍出现省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情况。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从目前的项目安排看，仍然将维持而且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垂直分工格局。

第二，西部地区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及其所决定的主导产业的特殊性质、二元经济结构、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体制，导致主导产业及其扩散效应较弱，也制约了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持续深入。罗斯托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和“起飞”，是一场工业革命，其成功取决于“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既取决于主导部门的迅速成长，还取决于主导部门对相关产业的带动程度，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他认为，发展的主导是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正是主导部门接连不断的高潮继起，推动着工业化和增长的持续。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很好地响应主导部门创造的潜在的扩散效应（回顾、旁侧、前向效应），不能在主导部门发展中带动相关产业的蓬勃兴起，工业高潮和经济起飞就可能流产。只有当整个社会存在对主导部门提供的潜在的相关产业机遇出现响应时，整个区域经济才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工业化和持续增长。^①西部地区恰恰在主导产业和扩散效应两个方面都存在结构缺陷。首先，主导产业不仅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弱，而且孤军深入，区域配套条件差，产业链条短，带动性弱。尤其军工的保密性和封闭性，扩散效应存在先天不足。军事工业的保密性和封闭性，中央直接投资和高度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主导部门的融合

^① 罗斯托编，贺力平等译：《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性差、关联度低、带动能力不强、产业链条短、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对社会分工和协作的破坏。这样的结构特征和管理体制怎么可能带动地方经济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呢？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具备对主导部门成长中创造的潜在商业机会和相关产业机会作出响应的充分准备。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后同）、长三角（长江三角洲，后同）与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的关系，则是相得益彰。一方面，上海、广州、香港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辐射能力；另一方面，珠三角、长三角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而且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创业当老板的意识十分强烈，区域经济、民间经济、中小企业充满活力。东南沿海乡镇企业、民营经济、非国有企业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才能在改革开放后借助于上海、深圳、香港的辐射作用，借助于主导部门和大型企业的辐射作用而得到蓬勃发展。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质和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增长速度、竞争力和整体优势，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果。^① 这是我们要尊重的客观规律。

还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说西部地区以军工、重工、大型中央企业为主导的结构制约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具有规模经济的大工业和重型结构，没有什么不好；军事工业在任何国家都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在不发达的基础上强制推进的国家工业化中，出现了对国家的高度依赖甚至绝对依赖，一旦国家支持发生改变，这种结构就面临了危机。特别是“三线”建设刚刚建成，羽翼尚未丰满，甚至许多工程还没有完工，就面临了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断奶”的同时还对沿海和非国有经济实行倾斜和照顾，这种结构的负

^① 陈刚、陈红儿：《区域产业结构优势比较与案例分析》，《区域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面影响自然更被放大。这里的关键是，国家的制度取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无疑，大企业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创新技术，更节约成本，因此具有规模效益。大企业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从大企业自身来说，大企业也更具竞争力。正由于此，20世纪初以来，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不断加速，企业大型化成为一种趋势，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大。但在转型经济中，大企业的这种经济性，却被制度和改革的难度所困扰和扭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企业在转型时期具有了特殊的优势地位。小企业所具有的灵活性、创业意识和活力，对就业的积极意义，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看到小企业的另一面。小企业对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假冒伪劣和不正当推销手段对市场的冲击，我们都有切身体会；国家三令五申整顿和关闭“五小”，也证明其看到了这个问题。从小企业自身来说，竞争力一般也是无法与大企业相比的。但是，改革开放后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个体企业、“三来一补”企业等为主体的小企业，与大跃进时期大搞“小土群”和“文革”年代全国普遍发展“五小工业”是不一样的。现在各地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区域经济、块状经济，与“大跃进”年代大力推动的“地方工业”也是不一样的。小型国有企业和县属国有企业先改制并获得更多的优惠和照顾，也并非国家有意要扶持小企业牺牲大企业，而是因为意识形态转变的难度太大等原因造成大企业改革的困难，不得已，先从容易的环节改，当然，还因为小企业太困难而不得已的原因。向沿海的倾斜政策，也是当年改革开放突破口的必然选择。现在人们看到，当年珠三角、长三角特别是温州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小企业，已经成长壮大起来，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企业管理和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改观，浙江规模以上企业，现在4成以上是非公经济。许多人不由得感叹说，现在反而成了过去那些以假冒伪劣

形象著称的非国有经济的小企业要求规范市场。我们认为，这些企业的成长，既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又得益于他们的创业热情、勤奋精神和有生命力的企业体制，还得益于能够从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取资源。应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体制竞争的胜利而不是因为小而取胜，他们符合新的制度取向！同时，小企业也不能因为这种胜利和优势而忽视潜藏的问题，要进一步向专、精、尖、特发展，真正建立起大中小企业紧密联系的企业组织结构。

与这个问题类似，报告还讨论了轻重结构问题。从理论上讲，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具有进入门槛低、见效快、有利于资本积累等优点，其内含的意义是，让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中“自动”提供利润从而积累。重工业则进入门槛高、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但是，重工业对于增强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和工业实力，具有重大意义。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看，一般是从轻工业启动的。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却是学习苏联经验并直接在苏联的援助下，依靠党和国家的组织力量，依靠低工资制度甚至无偿劳动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强制积累手段，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和重工业优先。应该说，这样的发展模式虽然会使广大人民群众为此付出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三代人的牺牲，但从追求积累的效果看，这是一条更快的工业化道路。为什么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呢？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要转向轻工业优先的发展道路？我认为，不能说生产资料和重工业优先是错的，也不能说轻工业优先是错的，关键要看你自己的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包括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发达国家能够实现从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的转变，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自身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发展中国家需要向他们购买工作母机，产品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且具有高额利润甚至垄断利润，因为只有他们的产业和技术达到了如此水平，他们控制了产业高端和利润高端。

低工资强制积累的重工业优先道路，在时间上和强度上是有限的，不能无限期地长期使用，特别不能有决策失误。这种发展道路的作用范围也是有区别的。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里走这条道路，但从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区域来说，就不能这样。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转向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发展，在物资严重短缺的年代，在改革政策的松动下，消费者必然选择东南沿海的产品，从而使其快速实现利润、积累和工业化，全国人民包括西部地区的消费者是心甘情愿购买东部的产品从而为其提供利润和积累。再从世界范围看，产品最终需要面对广大消费者，别的国家不买你的产品，你的利润就没法实现，工业就没法前进。你不能长期只在国内循环。从生产者角度看，生产者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你不提供这种产品，会有其他人提供，只要市场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你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你需要的产品，你需要出售你的产品，你必须参与世界经济，你就实际上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你就不得不遵守世界经济的运行法则，这时究竟应该重工业主导还是轻工业主导，就不能够主观臆断，而要取决于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

那么，这两种积累方式：消费者“主动”积累和国家工业化的“强制”积累，谁更有利于工业化呢？我认为，前者更有持久性和生命力，虽然后者具有特殊的、赶超性和突破性的爆发力，但前者更容易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积极性，甚至有时候是“被动”的积极性。只要一个社会是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下运行，企业就必须有盈利，消费者就必然在购买中“自动”提供积累。而在消费者这种“自动”积累推动的工业化中，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工业化水平得到提高，很有“寓军于民”的相同意义。我们在实行了30年之久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方针后，鼓励发展轻工业，不仅需要这么做，让这一代人喘口气，而且也是必然的选择。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西部地区的重型结构是不合理的，这也是眼看着东部发财而西部地区的产品卖不出去的一个直观反映。是市场的教育。在整个国家的体制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背景下，在日用消费品十分短缺的市场条件下，你不根据市场的需要去改变结构行得通吗？你能够繁荣发达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粮票布票和限量供应至今还记忆犹新。为什么要选择改革？计划经济带来的决策失误能够避免吗？这些问题早已有了答案。

在研究工业化时，自然不能没有城市化的内容，本书对东西部城市化差异及西部战略进行了讨论。我认为，从人口密度、城市密度、城乡人口结构三个方面观察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水平，我国东西部城市化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但尽管如此，东西部城市化水平却都有相当提高，东部通过人口密集、城市密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推动着城市化水平以惊人速度提高，西部虽有差距，但通过大量农村人口流往东部从而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人口相对比重增加也带来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从整体看，我国城市化水平早已达到50%。本书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工业化与城市化。从工业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国际比较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提出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0%的判断。并认为，我国不存在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第二，从人口密度、城市密度、城乡人口结构三个方面观察城市化现象从而东西部城市化存在较大差异，认为，从效率更高并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合的要求出发，西部城市化宜采取大城市与城市圈结合的战略，即，优先发展大城市，并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为轴心，以轻轨交通、通勤铁道、高速公路为纽带，在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发展若干发达的城市群、城市圈；不宜遍地开花地、脱离工业化和经济基础孤立地发展小城镇。第三，中国的城市化也